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一般預計，這次會議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走向會有重要的影響。本刊歡迎海內外作者來稿，就中國的未來展開討論。

——編者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越級式依附下的權力結構

李中仁的〈「越級式依附」——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與外資企業〉（《二十一世紀》2013年8月號）一文，揭示出地方政府向外資企業伸出「攫取之手」，而外資企業則轉向更高一層政府尋求「庇護」，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政企關係：越級式依附。該文借助個案分析清楚地指出，「掠奪型地方國家」與「發展型地方國家」在中國共有。實際上，這幅圖景所展現的仍然是企業對政府的適從以及政治權力的自上而下性質。

越級式依附還是一種「庇護—依附」關係。大規模的「築巢引鳳」項目確實表明高一級地方政府力圖動用一切資源來吸引外資直接投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發展型地方國家」之特徵。然而，外資企業需要借助其特殊的政治資源和「親密關係」才能抵禦「掠奪型地方國家」，這本身就說明在這種合作關係中，高一級政府天然具有某種主導性。然而該文也注意到，這不過是「庇護—依附」關係的延續。可見，長期的庇護傳統有其政治生態，不見得穩定卻影響甚大，自負盈虧的企業為了獲得有利於己的社會

資本，而對威權性質的政府產生了難以剝離的依賴。

陳華文 北京
2013.9.3

更要「三分」與「向外」

盧毅的〈國民革命後期的工農運動激進化〉（《二十一世紀》2013年8月號）一文強調，國民革命時期中共組織薄弱，無法控馭工農運動；加上底層民眾被哥老會等傳統民間組織掌控，是運動「極左化」的要因。讀完全文，似有兩處明顯「遺漏」或有欠「全面」的地方。

一是全文採用了左、右兩分法。對民眾運動的分析，結論不是左傾，便是右傾。從學術的角度而言，這種兩分法缺乏對民眾運動的全面審視，研究者也陷在了左、右之中。國民革命後期的蔣介石、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都是兩分法的實踐者：不是聖賢，便是寇仇，就是他們奉行的政治革命的標尺。只要運用這標尺，必然帶來革命或政治的殘酷打擊。國共雙方長期的黨史教育，容易潛移默化地進入研究者的大腦。除了非此即彼的兩分法，「三分」、「四分」有沒有可行性

呢？是不是可以從「中間」出發去評析左右之術呢？

二是盧文對國民革命後期的民眾運動研究，視角完全「向內」，從中國內部去找運動左、右兩極化的原因。國民革命是在蘇俄金錢和武力的支持下，在國共兩黨既合作又鬥爭之中，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我們不能因為民眾運動最終被國內政治力量所控制，就忽略了「向外」，向蘇俄尋找民眾運動發生發展到停止的多重因素。它是國內國外不同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結果。

李翔 廣州
2013.9.13

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宋磊在〈中國式經濟民主之爭中的主義與問題〉（《二十一世紀》2013年8月號）一文中論述了當代中國學術界關於經濟民主的探討。作者的潛台詞是在沒有政治民主的中國，經濟民主可以先行，並通過建立經濟民主最終達致政治民主。

首先，在目前中國很多人有一個錯覺：共產黨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專制政治，但允許自由經濟，而且效果（至少到目

前為止) 非常好。但這些人都忽略了一個重點：在極權政治下的經濟體系絕不可能是自由經濟。宋磊在文中列舉的幾個當今世界之經濟模式：日、韓、德、美，全是民主政權。

其次，即便宋文中指出的目前大陸學者較推舉的美國自由經濟模式，也絕對難以與中國現時剝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相比。美國的經濟模式，不管多麼自由和放任，其運作絕對受制於法律。雖然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但那是一種正常和純市場學上的現象。而在中國大陸，很多的大企業都由中共壟斷：國企不用說，私企很多都是半官方，其運作和最終營利也須由中共來掌握。

最後，宋文中提到現時中國主流學者首肯推崇私有化和自由競爭的「市場主義或美國模式」，認為此模式非常適合現時中國國情。但這些學者似乎把美式自由和現時中國的國家剝削混為一談，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所以文中的所謂「自由主義學者」在今天的中國非但沒有在行動上為社會公義和弱勢群體發聲，反而不自覺地成了中共弱肉強食的經濟政策的代言人。

由此看來，現時中國經濟學家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爭論「經濟民主」的概念有點為時尚早或南轅北轍，因為沒有政治民主何來經濟民主？

李劫 英國
2013.9.2

為何要反叛？

李若建的〈中國農村的反叛與民間宗教(1957-1965)〉
(《二十一世紀》2013年8月號)

揭示了在中共連續出台錯誤政策的時期內，最下層人民是如何在各種民間宗教的裹挾和誘導下走上無望的反抗之路的。筆者較粗淺的認識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甫一結束，這些種類龐雜的地方會道門組織經過當局的毀滅性打擊後，已再無出頭之日。但沒有意識到，政治上的打壓與軍事上的圍剿其實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經濟上的衰退、農民利益的受損、各種徭役、賦稅的徵發和徵收，才是各種帶封建色彩的民間宗教得以「復興」的溫牀。這些壓迫達到一定臨界點，就會釀成所謂的「暴動」或「反叛」。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這也是中國農民以及城市弱勢群體利益日益受損的時期。拆遷、環境污染、野蠻的城市管理、固化的社會分層等等，已經使得城鄉、官民、以及草根與精英之間的隔閡愈來愈大。如果今後經濟的發展再不注重平衡各方的利益；如果政治體制的改革仍舊不能使上下階層之間形成一個良性互動的話，那麼任何一個小的糾紛，都有可能釀成對社會震動的大事件。

宋國慶 南京
2013.9.6

左右之爭的出路與窘境

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但並沒有帶來中國社會的普遍富裕，相反的是貧富的兩極分化更趨嚴重。就政治改革而言，中共仍然堅持着一元化的領導體制，還沒有表現出任何向憲政民主轉型或是漸進轉型的可能。

在此種情勢下，中國的轉型道路之爭亦顯得愈加不可捉摸。正如陳宜中在〈社會經濟公正與中國的憲政民主〉(《二十一世紀》2013年8月號)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國社會已然嚴重地存在着經濟不公，這無益於中國轉向一個好的、穩定的憲政民主體制，甚至正在成為中國轉型的障礙之一。陳文還剖析了中國當代社會思潮中的「左」與「右」的成因與局限，指出左派的「左之不左」，以及右派的「比右還右」的現實。

但是，左右兩方對社會和國家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建構與解構。中國左右兩派的知識譜系不是來源於對西方政治哲學問題的思考，而是歷史反思的產物，意味着福利—自由這樣的命題範疇本身較為遠離中國左右之爭的問題域。中國的左右之爭更多的是築基於充分發揚毛時代的資源，還是徹底否定歷史走向憲政的命題上？在知識譜系上試圖構築底線的結果就不可避免要左右受敵。

李湘寧 北京
2013.9.6

更正與致歉

在8月號李中仁：〈「超級式依附」——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與外資企業〉一文首頁的題目(頁76)中，「超級式依附」應為「越級式依附」，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編輯室
2013.9